



国共两党携手,发动汉族黎族群众3000余人,历时半月击退盘踞那大日军

琼崖抗战首克重镇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张琳

儋州市那大镇东风路,一座基督教堂巍然矗立。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西式教堂,见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琼岛西部的风云变幻,更亲历了琼崖抗日战争时期一场重要的战斗——围攻那大战斗。翻开史册,追访旧事,庄严神圣的老教堂风云突变,隆隆枪炮声依稀入耳。

日伪盘踞那大 我军西迁受阻

1939年,日寇侵琼。4月16日,日本侵略军循海道在白马井登陆,入侵儋县,并在白马井设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随即侵占儋县县署新州。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5月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伪军詹松年部侵占琼西重镇那大。日伪军以那大基督教堂为据点,驻有日军100余人及伪军1个中队200多人。

“那大西北通白马井海道,东北接澄迈、临高,东南直通琼崖五指山腹地。”儋州市委党史办公室史学副研究员唐卓昌介绍,彼时那大是琼西重镇,交通要道。“那大墟的日军犹如一颗钉子,钉在进入琼西山区的重要关口,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要西迁,一定要拔掉它。”

1939年10月初,琼崖特委、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对当时的抗日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认为琼崖抗日战争已由琼山、文昌扩展到了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五县,而特委抗日总队仍偏居琼文一隅,不便领导全局,且琼文地处平原,为日军瞩目地区,不宜持久抗战。

为适应发展和变化的抗战形势,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积极酝酿西迁,向



儋州市那大基督教堂,见证了琼崖抗日队伍击退驻那大日军的历史一幕。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临高、儋县山区转移,创立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但那大的日军是个大障碍,为此,特委派遣独立总队队附马白山率领第三大队到儋临地区,加强对琼西地区抗日的领导。

两党携手抗日 各方队伍集结

“当时敌强我弱,那大日伪军训练有素,且武器装备精良;第三大队只有200多

人,装备差,特别是缺乏攻城武器。”唐卓昌介绍说,马白山经多次调研,最后确定作战方案,决定扬长避短,打一场人民战争。

战前,马白山与国民党乡政等各方面人士在南丰乡松门村召开联席会议,共商携手攻打那大事宜。会议决定成立围攻那大行动委员会和指挥部,并推举马白山为行动委员会主任兼总指挥,第三大队大队长张开泰、政训员陈石以及洛

基乡长朱文凤为行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副总指挥。

同时,决定由洛基、陶江、南丰、和祥、和民、清平、兰洋等乡组建的地方抗日武装,配合第三大队对日军作战。各方队伍迅速组建起来,大家摩拳擦掌,士气高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但是,兵强马壮の日伪军并不好对付。那大墟虽无城墙,但地势高,且四周无

房屋,视线好。而日军占据了制高点那大基督教堂,易守难攻。“当时在那大周边十多公里远都能看到教堂钟楼的尖顶。”唐卓昌介绍,日军只要在楼上架一两挺机枪,便足以对付进攻的正规部队,更不用说只拥有土枪土炮的抗日武装了。

没有攻城武器,强攻明显不行。围而不攻,断敌给养,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10月21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国民党儋县游击队第四大队、各乡游击队以及汉族、黎族武装群众3000余人开始围攻那大日伪军。各方按既定计划迅速行动。各乡群众破坏通往那大的公路;各乡武装群众和民兵封锁进出那大的所有通道;武工队潜入市区获取情报;国民党各乡政人员清查户口,严防奸细,严密封锁消息。

铁桶围城半月 敌军不战而逃

围攻那大战斗打响后,主力部队部署在那大四周,如有日军出动,则给予伏击,夜间又不断骚扰。日军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进不得,退无路,居不宁,龟缩墟内,惶惶不可终日。此外,因交通中断,又慑于我军声势,驻守新州的日军也不敢前来救援。

琼纵骁将、抗日英雄符志行也参加了当年的战斗,他在《剑花·符志行专辑》中写道:“当时参与围攻的武装群众很多,但多是带土枪土炮的老百姓,对敌人的威胁不大。尽管如此,因围攻的人多,日军也不敢出动,只呆在阵地守卫。”

围城日久,龟缩在那大墟内的日伪军供给断绝,而我军人民战争的优势得到凸显,各乡群众踊跃送钱送粮,抗日武装的供给不断得到补充。半个月之后,孤立无援的日伪军终于坚持不下去了。

11月5日深夜,围城队伍再次发起大规模佯攻。火药枪、山猪炮,甚至锣鼓、碗盆都用上了。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四起。早如惊弓之鸟的日军仓皇出逃,伪军詹松年、日军顾问吉村幸雄率众弃城逃跑,企图与驻守新州的日军联系。我军突击队则乘势冲入城中,来不及逃跑的1个伪军中队80余人乖乖缴械投降。

出逃的日军不断遇到抗日游击队和村民的伏击。《中国共产党儋州历史(第一卷)》中记载:6日早晨,日军即将接近中和水井村地界时,村民曾千山立即召集抗日武装,赶往水井岭公路两侧设伏。疲于奔命的日军进入伏击圈后,遭遇村民自制土炮“过山鸟”轰击,队伍被打散。抗日武装边打边追,追至黄牛坡时,“过山鸟”又响了,包括日军顾问吉村幸雄在内的不少敌人被轰倒,纷纷滚下坡底。桥底。曾千山急追下坡底,冲过桥头,用大刀砍下了负伤的吉村幸雄的颈部。

围攻那大一役,我军击毙日军指挥官1名,打伤日军多名,俘获伪军中队以下官兵80余人,缴获步枪60余支,子弹数千发,军用物资一批。

“围攻那大一战,意义重大,这是琼崖自抗战以来我军首次攻取重要城镇。但攻克那大的政治意义,比攻克那大本身更加重要。”唐卓昌说,攻克那大一战,使我党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那大乃至整个儋临地区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并变成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自觉行动。同时,也为我党创建木排为中心的大南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发展琼西南的抗日斗争形势。此外,也为琼崖特委、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西迁创造了条件。

(本报那大7月26日电)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饶思锐

农民工有“娘家”权益才更有保障



■ 饶思锐

今年我省各级工会系统将发展农民工入会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便最大限度地使农民工吸收到工会系统中来。当前,在琼务工的143万农民工中,已有29.2万人被全省组建的1.7万个基层工会发展入会。(7月24日《海南日报》)

广大农民工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别亲人,告别故土,投入到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浪潮之中,他们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劳动大军,是新时代的新特色。可以说,广大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工人阶级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工会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也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是职工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让农民工异地就业找到自己的娘家,既是工会组织与时俱进、健全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团结、凝聚、服务农民工群体的需要。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宣传工作不到位、农民工流动性大、基层工会作用发挥

不够和凝聚力不强等诸多原因,使得农民工入会积极性不高、入会率较低,目前我省113万多农民工游离在工会组织之外。加之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工群体维权困难的事例屡见报端,推动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已刻不容缓。

推动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迫切需要创新工会组织形式。多数农民工面临着工作单位不稳定、工作地点不固定、流动性强等特征,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的问题,农民工可能面临着反复入会、多地入会等问题。这迫切需要工会创新组织形式,探索建立流动会员机制和便捷转会机制,使其一地向

会,多地流转,从而使流动的农民工有了“铁打的工会组织”。此外,农民工群体普遍收入较低、收入不固定,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要探索农民工会费减免、代缴机制,切实减轻农民工负担。

推动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还需要切实发挥好工会职能。首先,要努力做到工会经费向基层下沉,要从人、财、物等方面更多地向农民工倾斜,切实保障好基层工会组织的办公场地、人员、经费等,使基层工会组织更有力量。其次,要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做好其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等权益维护工作,维护好女职工特殊权益,帮扶困难职工解决医

疗、子女就学等问题。再次,还要不断丰富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心理咨询、技能培训、业余文体活动等多种多样的工会服务,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

只有不断加强宣传、创新服务,让农民工深入了解工会、信任工会,有更多获得感,才能增强农民工入会积极性。也只有把工会力所能及的工作与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形式,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民工诉求、维护好农民工权益,才能让“职工之家”真正成为农民工“温暖的窝”,才能凝聚和引导广大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案卷失踪后 法律不能玩失踪

■ 戴先任

据澎湃新闻报道,山东菏泽市张俊旗因对定陶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7月10日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但因为法院案卷失踪,从1996年等到2015年,张俊旗依然没有等到自己已上诉案件的二审开庭。因为案卷失踪,这起并不复杂的刑事自诉案件已经延宕了19年。

很难想象,一起刑事案件的案卷在原告上诉期间,却凭空消失,到底是有人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不管是哪种原因,这种情况都是绝对不允许发生。丢失案卷本身对原告双方的权利都有损害,也使整个案件难以推进,让简单明了的案件变得异常复杂起来。

亡羊为何不补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在发现上诉案件材料不齐全的,应当通知一审法院5日内补齐。本来是法院的错误,将案卷弄丢,法院应该赶紧改正错误,补齐材料,审结案件,还要找到案卷丢失原因,如果是有人有意为之,则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如因法院内部工作流程存在漏洞,也要赶紧亡羊补牢。但长达19年过去,定陶县人民法院不仅没有追查原因,甚至把因为法院原因而耽误的原告晾在一边达19年。现在看来,案卷丢失,相比于19年来该案被搁置,还只是相对轻微的过错。

案件烂尾是对司法正义的亵渎。司法部门本应是法律的守护者,而在这次案件中守门者却成了法律的无视者。案卷失踪,相关法院应该零容忍,做好善后工作,又怎能因案卷失踪将一起刑事自诉案件变成了烂尾案件。如果此“经验”被复制推广,法律的尊严将荡然无存。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如果案卷会平白无故丢失,原被告双方的正当权益可以多年无视,当地司法正义便只停留在纸上。

只有司法正义,社会主义才会无远弗届。若非张俊旗19年来每年都坚持到定陶县人民法院打听案件的进展,并被媒体曝光,这起案件的命运必然会不了了之。法律底线不可触碰、不容亵渎,手执法律公器的司法部门,更要坚守法律原则,恪尽职守。只有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追查责任,案卷丢失案件才不会成为糊涂账,类似的事情才不会反复发生。法律必须要做到无远弗届,无论是空间上的还是时间上的,只要案件没有终结,就应该继续追查下去,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邮箱:hnrpl@163.com

“状元游街”是教育改革的倒车

来 论

■ 龙敏飞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7月25日,山西晋城皇城相府2015年全国高考状元封典礼在此盛大举行。来自甘肃、吉林、内蒙古、山东、河北、河南、山西7省自治区的10名高考状元,身穿状元服,肩批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进入皇城相府御书楼广场,接受“康熙皇帝”“第一甲状元赐进士及第”的敕封,每人赏“诏书”一册、人民币10000元。

从2004年7月开始,教育部就反对“炒作状元”,希望各媒体和网站停止此类宣传;2005年,教育部又发布高考宣传“八不准”通知,其中就有不围绕任何高分考

生个人进行宣传……而此后,几乎每一年,教育部门都有类似的强调,但效果甚微,炒作高考状元一如既往地火热,比如这次的“状元游街”,便是对禁令的一种无视。因为教育部的禁令只是倡导性质的,没有强制性,所以无法从根本上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约束。

而相比起无关痛痒的规定,现实的各种利好则是很多参与者无法舍弃的。对学校而言,出了状元也就有了教学成绩,近年来屡见不鲜。因此,除了政府保障外,还应赋予见义勇为者损害求偿权和责任豁免权。此外,各地见义勇为为地方立法在各方面,并不一致,也亟待以法

难敌现实诱惑。

但“状元游街”这类炒作,其负面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这对状元们的心理成长而言是不利的,社会过分的追捧,必然会增加他们的虚荣心,而与虚荣心相伴的,则是傲慢与骄横的气息;另一方面,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的评价体系,过分的追捧与炒作高考状元,只会继续加深一些人对“分数”以及应试教育的误解,从而使高考改革的阻力增大。

要知道教育的目的,不是给人提供炒作的对象,也不是制造“分数的囚徒”。而当前的现实,却步入了这些沉疴。“状元游街”俨然成了教育改革的反面案例,只有让教育回归理性、去除不必要的功利化,才能让素质教育尽早照进现实。

律统一规范见义勇为。

④法制网:“少而精”的管理将更科学。集中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之后,政府对职业资格实行少而精的“清单管理”,对促进就业创业承担的职责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将大为突出和强化。政府将继续为公民就业创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刻也不会放松。(晓 轲)



图时
说事

商家行贿也治罪

据媒体报道,为承包医院的建筑装修项目并获利,承包商周某向某医院负责人行贿20万元,并顺利取得了该项目。周某本以为是隐秘安全的一笔交易,却随着受贿人的落网而案发。日前,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以行贿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五年。

或许,行贿者会觉得有点冤枉:自己花了钱揽来工程项目,也是社会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其公然违反国家相关法律,以不正当的手段介入竞争,不但触犯了刑律,也破坏了

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若不依法惩办,官风、党风、民风又如何能正起来呢?只有坚决地将行贿者与受贿者共同治罪,反腐败才会收到预期效果,清正廉洁才会成为政坛的普遍风气,人民大众才会真正扬眉吐气。这正是:

商家行贿也治罪,
岂容恶俗漫天飞。
法律不是装饰物,
反腐惩劣兴风雷。

(图文/吴之如)